

恩 维 尔 · 霍 查

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

人 民 出 版 社

书号 3001-1138

每册 0.09 元

今天，政治局在教师节讨论学校问题是个偶然的巧合，所以，我们把最良好的愿望寄与正在不辞劳苦地履行崇高的爱国主义义务的我国全体教师，并借此机会，以感激的心情祝愿他们在党的道路上，在对我国年轻一代进行革命教育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俗话说：“生活就是学校”。在唯物主义哲学的语言中，这就是说，学习应该永无止境，应该同整个生活并驾齐驱，也就是说脑力劳动不能同实践分开。这就是说，劳动，创造，思维在人的整个生活中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的生活中，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学习、思维是物质的辩证发展的产物和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学习、思维的向前发展，不单纯是一项任务，而应该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现象联系到和来源于对物质的改造、物质的辩证的发展和改造，因而也是人和社会的一种客观需要。同人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一样，人作为物质的自然存在，在任何时候，在他的生活的任何阶段，都在不断地得到改造。他创造，思维，学习，再创造、再改造，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看成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学校，也就是根据这一唯物主义发展规律建立的。学校和学习不应该被看成是只属于人一生中的某一时期的孤立的东西，或者被看成是在一系列为了便于进行教育和学习的组织工作而确定的准则的范围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奠定足够的和完美无缺的基础。

从这一规律中，产生了学习和教育的群众性的问题，也即党经常指出的，所有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毫无例外地都应该学习，受到教育，以便进行创造，并让思想来指导生产和社会发展。但是要使这种发展沿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道路正确地前进，就要使思维、教育和学校在其各方面都以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基础。

我们说，八年制教育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事实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和应当懂得，各种类型的学校，都应该实行义务教育，而不仅只局限于目前我们所确定的学制。我们不应该象对八年制学校那样，用单纯的法律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而应该以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规律来理解它。

办学和入学问题，即人一生中不断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短期内和仅仅局限于当前开办的学校的范围内所不能解决并加以完善的，因为，尽管学校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进展性的变化，但本身仍然还保留着资产阶级学派的哲学的某些唯心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以其陈规旧习占领了我们许多人和许多教师的头脑，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跟在后面走，阻碍他们前进，使他们变成保守主义者。

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任何事物一样，我们的新型学校也应该有其适合社会经济结构并为之服务的发展规律，因为学校和教育应该是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指引下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同组织劳动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并且在组织劳动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同时，也要举办学校和教育事业，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需要，使生产经验为思想服务，用物质发展来阐明思想，以思想来指导和帮助

革命实践的发展，指导和帮助社会的发展和改造。

我们接收了解放前的一批小学和中学。这些学校，组织混乱，五花八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办学方针和课程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缺点，更不用说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完全格格不入的政治、思想和教育路线了。索古政府即土耳其式的封建制度反对人民接受教育和学习文化，因而对学校漠不关心。

不仅在愚昧无知的农村，而且在城市，小学教育也是极为有限的。有些地区有一些小学，但为数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为数更少，上这些学校几乎成了一种特权。所有的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都是屈指可数，而且只是分布在几座大城市中。

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索古政府在学校方面的政策，尽管索古政府实行反动的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地企图阻碍这一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制度下所开办的那些小学或者中学，也应归功于人民、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愿望和压力，而不能归功于索古政府及其政策。在索古制度下，教育发展甚微，尽管在形式上和基本内容上残缺不全，但这也都应归功于人民的求知欲望，因为人民有意无意地在封建制度的愚民政策的黑暗中为寻找光明开辟了道路。

在索古制度时期的办学方针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即使在这样的范围内也是极其混乱的。在这种方针中，不同的资产阶级学派的办学方针是互相矛盾的。这些资产阶级学校是索古政府对企图掠夺我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媚外政策的结果。在这些不同的办学方针中，犒赏索古政府金钱最多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办学方针就占上风，而索古政府也没有忘记讨好那个企图施加它的影响、并为它自己的下一步获得租借地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获得强有力的地位时，我们就看到在学校以至小学，在它的结构和内容方面，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样一来，在索古制度时期，我们有“本国”的中学，基督教学校，法国中学，美国和意大利技术学校。只是土耳其和希腊没有开办中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没有或者不可能从索古那里得到租借地。索古准备把祖国一块一块地出卖给任何人，就象他把许多领土租让权出卖给南斯拉夫人、英国人一样，而最后，他把整个国家奉送给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

在我国学校所处的这一混乱局面中，唯一可取之处和值得称赞的工作，是教师为学校的系统化，使学校定型，以及尽可能地满足人民求知和学习的愿望作出的巨大的努力。

简单地讲，解放前，我们不可能开办和发展学校。这里我不想分析这一过程，因为这是教育部门的专家应当去客观地完成的一项任务。如果这种分析是按照（也应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今天就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应该进行这种分析？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呢？

第一，因为尽管当时的学校有其缺点，但是它在唤醒人民方面仍然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大多数人在当时所处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是尽自己的知识，尽自己的可能，尽自己的办法为人民服务的。尽管那时的学生、教师、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和中等技术人员人数很少，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接近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学校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忽视。

第二，因为在解放后直到一九四六年进行第一次学校改革，我们是以旧学校为基础的，依靠的是过去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曾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就是现在（当然大有不同）仍然还是负担，它表现在许多老的甚至年轻的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的明显的保守主义上。尽管如此，同我国一切事物朝着进步方面变化一样，学校也得到了改造。我们进行的学校改革在这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学校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帮助。后来我们发现，被搬到我们的旧学校中的苏联学校的那一套，也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学残余的特点，也还有许多缺点，时间、积累的经验和国家的发展给我们指出了这些特点和缺点，并迫使我们无论在学校结构方面还是在学校的大纲和政策方面不断进行部分的修改。

当时，在学校问题上要我们另搞一套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干部。我们不能把过去的学校一概取消，如果一概取消，那就是犯错误。我们需要把过去的学校变为人民的学校，在城市和农村各地扩充这些学校，把小学教育变为义务教育，开办七年制学校，增加中等学校，实现七年制或八年制义务教育，增加中等技术学校，并派遣大学生出国学习，直到在本国建立大学。另一方面，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党和政府就致力于不断把作为知识的摇篮的学校变为以党的政策教育青年的重要场所。

的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执行党的政策的，许多人是拥护党的政策的，但尽管如此，他们在思想上，在工作方法和作风上，仍然保留着旧教育学的倾向和残余，保留着他们曾经学习过的国内外旧学校的倾向和残余。

现在，问题就不一样了。在学校问题上，我们有了近二十五年的新的经验。学校出现了一个积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达到了党所确定的许多目标。并且根据党确定的目标，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使我们的学校来一个向前的质的飞跃，这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需要。

但是，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质的飞跃，我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确定原则和我们应走以及如何走的途径。我们既不应陷入虚无主义纲领的泥坑，也不应作不正确的、缺乏健全标准的生搬硬套。

我们党对学校一贯执行有鲜明的倾向性的政策。它尽了一切可能，努力把学校和教育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去，使之同我国目前的需要以及全面发展的远景联系起来，同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需要学习的信念，创造了学习的可能性（因为教育成了群众性的教育），经济获得了发展，造就了大批沿着党的道路，遵循党的教导，忠实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和进行领导的干部。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稍微深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学校过多地被看作是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场所，任何事情都主要是服从教育学和教学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有这种倾向：教师、教育工作者是学校问题的唯一的权威，只要交给他们路线和方针就够了，其他的事由他们去解决和领导。

我们不断批评有些党员同志不太关心学校。即使当他们被迫到学校去一下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也只是学生的升级率，某种物质上的需要，学生出勤是否正常等。因此，他们所关心的多半是形式方面的东西，而把自己置于学校之外，他们还对此进行辩护，说有许多其它的工作，首先是经济工作。所以，党员同志还没有足够地和很好地懂得学校同生产的联系。而当我们讲这个问题时，应该懂得，这种联系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另一方面，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是完全脱离生产的，他们虽然对经济上的变革是高兴的，并且也感觉到了经济上的需要，但是在学

校和教学上，仍然以墨守陈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采用旧的教学形式、旧的教学方法和旧的工作作风。更糟糕的是他们相信并自以为是任务完成得很好。而我们党和领导这一巨大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改造的党员，没有充分地、细致地关心学校，没有关心学校不断的变化和学校的发展动态。

近两年来，由于我国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使文教部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打破了它的沉静，暴露了它的问题。这证明了我刚才所说的，教育和学校的问题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既不能仅仅看成是一般教育工作者活动的场所，也不能仅仅看成是脱离生产和劳动的理论场所，而是党、人民、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一个大问题。

同样，也不能认为只要确立八年制义务教育，或者把大学生分到各系就够了。不，问题不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就使文教部面临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我们正需要对这些问题寻求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办法。

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并不简单，也不是通过一次讨论或者动动笔杆就能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防止用所谓大众化的形式掩盖起来的无政府主义作法，要注意主观主义观点，要警惕地防止对过去的国内外学校抱有好感的趋势和倾向，某些人的这种好感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因循守旧而变成了一种教条，这种教条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如果不说会办得毫无价值的话。因此，对我国的新学校中的任何东西都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详尽的分析，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学校中的任何东西，必须自始至终地贯串我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以此为指导。这是主要的条件。

我们的新学校，不能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学校，它应该适应生产

发展的需要，应该符合和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们的学校应该在它的各种学制中，在各种方法和作风上体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变成物质力量，应该紧跟并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发展。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助于生产，有助于发展思想和进步。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在办学方面，一切都是根据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方针进行的，或者轻率地认为，因为我们是苏联的学校为样板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犯错误，那么，教师、教育工作者就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在我们这里，已经证明，犯错误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没有经验，而且在于苏联学校本身也还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它也没有到头，它还处在发展当中。除此以外，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不同于苏联。

在对学校进行改造、充实和变革当中，我们应该以当前的形势和已取得成果为依据，并对此进行仔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我说的仔细的分析并不是只限于在教育范围内进行一种统计式的分析，而是应该同国家目前的具体情况，同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需要，同能否满足这些需要和填补这些空白点联系起来，并从物质方面加以了解，如干部的人数及其质量。这样，我们也就能了解目前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的阶段，也就能看到我们的空白点所在，并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切地提出我们的需要。

我们过去缺乏这种比较完善的步骤，但我们任何时候也没有闭着眼睛瞎闯。解放以后，由于除象我们当时那样不得不接受旧学校的某些东西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同样由于我国经济文化条件落后，我们在实行义务制小学的同时，还重视普及文化，努力

建立一个多种多样的中等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网。特别是在解放后的第二个十年内，我们开办了相当数量的中学，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学校提高青年的总的文化水平，培养一批我国在恢复建设时期十分需要的各种专业的、水平高的干部。这个方针尽管可能有和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是正确的。大批地培养教师的方针也是正确的。

然而，技术教育问题并没有完全沿着这条路走。如果说，在解放初期，我们开办了最起码数量的专业学校，那么后来一般地说，发展专业教育未被重视，有相当多的缺陷。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但这不能为不关心工厂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发展农业以及对其远景缺乏十分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开脱罪责。农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对此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在开办农业学校方面采取严肃的措施。只要我们从学校工作的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以我上述的分析为依据，我们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学校真正成为新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学校。

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社会主义的建设，生产、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十分需要有文化的人，这不仅是为了充实一些已列入计划的编制，而且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材，同时又不是清一色的人材。在学校内的学习和受教育不能被看成是进行投机和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如资产阶级哲学所认为的那样，而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代新人手中的强大的武器，用它来建设这个社会，把社会主义的公共生产推向前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服务。

如果我们从数量和质量上正确地看待这许多种需要，如果我们也用唯物的、历史的辩证发展眼光来看待满足这些需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即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类型的学校，而应该有各种类型的学校，其中也包括各种几个月的训练班。

至于八年制学校，我觉得，它应该保持不变，应该作为一种统一的类型。它的性质和方针应该和现在一样，就是八年制学校中的所有孩子毫无例外地都以一种普通的文化武装起来。然而，我认为，八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可以、也应该进行修改。教学大纲中可以包括劳动技能，但不要使之变成技术专业。青年在八年制学校毕业后，不管是参加工作，还是继续在比八年制学校更高的学校学习，都可以进入各种类型、各种专业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中学将是多种多样的。文教部提出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依据的健全基础，只是还需要修改，因为我觉得其中还有两个基本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文教部已处在下面的正确压力之下，下面为了满足生产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的紧急的需要，正在通过在工厂和合作社开办没有固定教学大纲的各种专业学校来寻找出路。

第二个缺点是，文教部更多地从职业、教学方式、形式上的纪律等来看待学校的未来及其改进的问题，把它看做是一种永远固定了的、很少同生产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一般的或者特殊的教育。事实是，对教育中的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结论是文教部下的指挥部作出的，然而这些问题却超出了文教部下的指挥部的权限，尽管这个指挥部是由数以百计的内行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组成的。教育事业是党、政府和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

关于我们将要对学校进行的这一切工作，我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在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极其广泛和重要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教育、工矿和农业部门（农场和合作社）中最优秀的

同志，青年，妇女，医生，体育工作者，音乐家，哲学家等参加。

为什么需要这些人呢？因为在制订了象我上面所说的方针后，他们将把学校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动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提出急迫的和远景的需要，由此就可以更正确地得出比例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确定满足需要所必需的时间和学校的各种类型。这是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解决课程问题和各门课程在各类学校和类似训练班中应占比例的问题，以使每一个在一种学校或训练班毕业的人能找到更高的、相应的学校或训练班继续深造。目前，这些问题解决得不那么正确，因为往往没有一个客观的方向，采取一些简单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例如采取这样的作法：在这门或那门课程里删去或增加这些或那些东西，以为这样做一切都能正确地解决。这些做法是、而且无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为了在教材中更好地反映出党的路线，但仍然不能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备的，任何时候这样作都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学历”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容许同我们格格不入的刺激和倾向存在，因为追求“文凭，名望，高工资，地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隐藏在所谓鼓励学习后面的这种情绪，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反社会主义的残余，这种残余我们应该清除，应该加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学习感。

有些人认为，新的一代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正规地学完全部学年，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只需念完为生产的需要而举办的成绩单可有可无的速成训练班和学校，但给这些人以完全的中学或中等专业学校的学历。这是没有益处的，也是不正确的。有人说：大学为什么对这些人关门呢？

应该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大学是高等学校，它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我国发展的行程中，将通过工作和各种形式的技能训练进一步专业化。因此，这种高度的熟练技能还要求有牢固的和完全的教育基础。大学对谁也没有关门，但是上大学的人应该有相应的文化程度。我们应该很好地作出这一规定。我们刚刚提出挑选大学招收的学生问题。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好呢，还是不好？为这项工作即将成立的委员会将研究和更正确地确定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在今后的阶段，对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要求要更高，这是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新条件所要求的。向更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技术阶段过渡，将导致学校得到根本改造，这种过渡始终应该适应需要，并为当时的形势服务。

但是我们不只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我们还需要大批受过中等教育的干部。因此不能以学历或者上完这个或那个学校来阻碍这个问题。一个由于许多主观客观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人，不可能象能正常上学的同班同学那样轻松。尽管如此，这个人不能不学习，社会不会抛弃他，而给他创造可能性，使他能念完一个学校，并继续在同类型的更高一级的学校进行函授学习；如果他还想上大学的话，那么，他应该为他在自己上过的学校中没有学习过的课程进行一些测验或考试。

上面提到的委员会将为党中央、政府和党组织开辟更加清晰得多的视野和远景，将为我们新学校的前进提出更加完善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我是怎样看待研究我们学校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问题的呢？

一、这种研究将使我们了解从解放到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将紧密地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来辩证地说明文

化教育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过程，将给我们指出当前的不足之处和需要。

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为我们科学地确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措施，以便把群众的一般文化程度提高到一个大致确定的水平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经济对中等技术干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的文化、教育、经济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的需要。

三、如果我们把这一发展阶段比如说称为第一阶段，为了过渡到更加发达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我们服务的许多形式、方法和措施，在第二阶段是不能完全为我们服务的，因为第二阶段要求形式、方法、措施更加完备，因为经济，以及与此同时还有人，将得到提高，并将达到更高的水平。

许多学校形式将取消，应该用另外更加专门化的形式来代替。目前我国，人们不仅不再是文盲，不仅念完了八年制学校，而且那些没有念完八年制学校的人，也上过专门的训练班和特殊的学校，再加上生活经验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切使这些人根本上得到了改造，就象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一样。

同一切事物一样，我们的学校将依次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将在形式上、结构上、内容上发生变化。只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即学校在每一方面、每一改造中由它的柱石——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指导。

因此，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和方式，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为一切实科学指明道路的科学教育一切人，教育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人民、工人、农民、大人和儿童。

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深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在这方

面，我们应该重新审查教材和工作方式、方法。各种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精密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一句话，学校里学习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基础之上。从根本上重新审查教材并加以修改，是我们面临的最严肃的工作之一，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教师才能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教材应该被看作是具体体现党的路线、政策及其当前的目标、纲领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新学校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共存的教材。我们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作任何让步，不应该对神学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有很多东西，我们应该把它们引入正确的轨道。以前我也说过，教材中水分多，但是我应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实践中，往往狭隘地来理解这个问题，把它极端简单化，并且还有一种乱砍课程的倾向。

就拿各门科学来说，各门科学都有了巨大的进展。没有标准地乱砍任何一门科学，这就是不科学的，这就是贬低科学。对自然，应该深入地、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一切东西都必须明确地反映在教材中，科学应该完全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我们以各门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来阐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教给学生、教师、教育工作者，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完全地理解发展的理论。

我听说，我们的教师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需要保留利奈的理论，是否需要保留他的一切分类，还是要精减。这一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对于利奈或者其他理论的这些纠正是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的，也就是说，要是去掉那些被植物学或其他某一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证明是多余的或不正确

的东西，那么，这一讨论就有更大的积极意义。不要象那些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这或那干什么”的人那样作。他们的方法有了某些改进，只有蠢人才会把它一笔勾销。学校里的男女学生应该学习真正的科学和理论——我们不应该忘记和低估这一点，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关于人类知识的相对性和反映物质不断发展的理论。

有些人简单地认为：“我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然而这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学习这些东西，不通过从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形式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就不能树立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就不能前进，相反要倒退，黑暗、神学和资产阶级哲学将要淹没我们。列宁认为，没有健全的哲学论据，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唯物主义，都不能抵挡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我们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应该耐心地学习，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热情的拥护者，一句话，应该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

教学大纲对于各类学校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即将确定的各类学校，应该制订不同的教学大纲，应该审查或重新编写有关的教材。与此同时，还应该认真地考虑培养新干部和更加提高现有干部的水平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在较好地掌握教学大纲后在各种学校进行讲解。提高干部的水平，不应墨守陈规，而对于干部本身来说，这是一个纪律问题，是学习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成立的委员会应该设立由各门课程的专家组成的若干小组委员会，它们的工作应该由健全的标准指导，应该得到中央的委员会的帮助，并在一定时期内，受中央的委员会的检查，而这种检查不能一年只是一次。